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
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所谓官箴，就是对各级官员的告诫。将其整理成册，便为官箴书。在中国历史上，官箴书的作者，如吕本中、朱熹、张养浩、陈宏谋等，或从地方官做到当朝宰辅，或为亲民良吏的典范。所作官箴书都是他们为官多年的心得，这些从政的经验和智慧，这些从实践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理性认识，对于初入仕途的官员来说，具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武汉大学出版社

官箴要语

彭忠德 赵骞 编著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彭忠德 赵骞 编著

官箴要语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养生要

知荣远辱

兵家韬略

谋略经纬

文人雅言

人生箴言

家训辑览

学规菁华

和谐融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箴要语/彭忠德,赵騫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10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冯天瑜 张艳国总主编

ISBN 978-7-307-05905-4

I. 官… II. ①彭… ②赵… III. 政治—谋略—中国
—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5276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12.25 字数:282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905-4/D·771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时代的步履已跨越 21 世纪的门槛，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世界统一市场建立、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俱分进化”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扬雄《太玄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诸层面，今人都患着不轻的“现代病”，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

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易经》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老子》的“有生于无”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三国演义》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孙子兵法》，“声东击西”是其赢

得胜算的谋略……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更高的灵性，继承、发扬先辈智慧，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

出于以上思考，本丛书试图介绍“中华智慧之集萃”，以为时贤提供参考。

何谓“智慧”？狭义的“智慧”约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聪明、才智，与“贤德”相对称，故有“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野。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中国不讲智性。我以为，区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确有必要，如果两相混淆，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然而，强作两分，把二者割裂开来，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本丛书所介绍的“智慧”，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而涉及广义智慧，或曰“大智慧”，包举才与德，兼容智与贤。如此议“智慧”，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中华智慧不限于“智性之知”，还包含“德性之知”，追求二者的统一，偏执一面、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多智而无德者（如曹操）被斥为“狡智”的“奸雄”；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如宋襄公）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如周公、姜子牙、诸葛亮）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仁、智、勇的统一体。从此种“大智慧”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何谓“集萃”？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而是编者从“中华智慧”涉及的各个侧面（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莘莘学子的学规、官吏奉守的箴言，乃至生态

平衡、家训要义、养生之道，等等），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并加以条贯、诠释。读者诸君手持一卷，春诵夏弦，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若通览诸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当然，如欲升堂入室，摘取智慧之果，则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因为大智慧的获得，是人生践履的结果，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下心来。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并虚心吸纳各种异域智慧，相互比较、彼此观摩，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

冯天瑜

2007 年金秋

书于丹桂飘香的武昌珞珈山

前言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机器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官吏作为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日益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

我国古代社会中，官吏代君“牧民”，参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管理，在承担职责的同时，也享有一定的特权与利益。荣登卿相之位，宰辅天下；担任封疆大吏，治理一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抱负，一旦踏上仕途，如何尽忠报国，如何处理公务，如何对待同僚与民众……都是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经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看了他人的成功与失败，一些官吏交流、总结出了大量的关于如何做官，如何做一个好官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这些就是被人称作居官要语的为官箴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历代官箴即是其中的一部分。兹就笔者整理官箴所及的一些问题略说如下。

从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史的角度看，“官箴”的含义及其内容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两词组成一词，由动词引申出名词，由文武百官规谏君主而变为对官员自己的勉励和告诫。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其中，“箴”是名词，指一种制衣工具：

箴，缀衣箴也，从竹，咸声。

段玉裁注云：“缀衣，联缀之也，谓之使不散。”〔1〕由许、段之说可见，所谓“箴”是古代的一种竹制细别针，人们利用它联缀衣料而成衣裳。当金属出现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先民创造的简陋“缀”衣工具便为金属制造的针所取代了，其字往往作“鍼”。它们的字形就已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咸声”依旧，所不同的是，“金字旁”取代了“竹字头”。正是由于这种渊源关系，古时“箴”、“鍼”通用。

古籍中，“箴”字还有一个《说文解字》所没有的义项，指针灸治病时所用之针形器具，也是名词。在古代，这种器具先是用石制成的，因此也叫“箴石”。《山海经·东山经》即云：

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

〔1〕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郭璞注此“箴石”云：“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1〕

箴石所治之病，是人之肉体所生的病。当某人思想、行为不合法制时，古人也认为这是“病”，便要对他进行规谏、劝戒、警告，这也叫箴。这是“箴”的一个重要引申义，不过它已是动词了，古籍中用得相当多，如《尚书·盘庚上》云：

无或敢伏小人之所箴。

伪孔氏传曰：“言无有故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此即释“箴”为“箴规”。〔2〕又如《国语·周语》云：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对“师”的职掌所做的解释是：“师，小师。箴，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3〕

先秦时，作动词用的“箴”似乎更多地用于下对上的劝戒。如《左传》云：

〔1〕《山海经·东山经》，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尚书·商书·盘庚上》，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国语·周语》，见清人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1〕

又如周武王灭商之后，见商纣王骄奢淫逸，恶贯满盈，终因拒不纳谏改过而亡国，忧惕之心大盛，便经常要求臣下直言自己的不足。为此，周太史辛甲曾组织过一次集体规谏活动。《左传·襄公四年》记载：

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西晋杜预注云：“辛甲，周武王太史。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唐人孔颖达疏解说：“太史号令百官，每官各为箴辞以戒王，若箴之疗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为箴辞。”〔2〕可惜的是，当时文武百官之箴辞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虞人之箴》因《左传》此处的引述而留下了一段文字：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

〔1〕《左传·昭公年》，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唐·孔颖达疏云：“《晋语》称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则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时，天命未改，不得‘命百官官箴王阙’，故以为武王时太史也。”据此，可以认为此次集体劝谏活动为武王灭商之后的事。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1〕

据《周礼》所载，山虞和泽虞等虞人掌管田猎之事。〔2〕从此数句看，是“虞人”在谏戒武王不要像前代昏君那样耽猎丧志。

今传《诗经·大雅》中有一篇长达约五百字、号称“箴铭之祖”的《抑》，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周代箴谏之辞的风貌。据前人研究，《抑》乃“卫武公刺（周）厉王，亦以自警也”〔3〕。此诗直言针砭了周厉王“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劣迹，希望他培养正直的品德，讲威仪，慎容止，用贤人，做民众的表率，等等。

从这两篇箴言看，所谓“官箴”，是指百官各据己职规谏君主。可是学术界有些研究官箴的人却根据《左传》此处记载认为：“‘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4〕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双音节词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上述《左传·襄公四年》引文中的“官箴”就不是一个双音节词，而是两个单音节词因为表述的需要而放在一起。“官箴”之“官”，名词用如动词，其义为“据所担任官职之职掌（去干什么）”；“箴”则是箴谏、规劝之义。

〔1〕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周礼》中无虞人之官，仅有“山虞”和“泽虞”两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泽虞掌国泽之政令……若大田猎，则莱野泽”，故杜预以“虞人掌田猎”概括注之。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此句为《诗·大雅·抑》“诗序”之语。《抑》及此序均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4〕高成元：《官箴的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那么,“官箴王阙”即应译作“(文武百官)根据各自所担任官职之职掌谏诫周王的过失”。前引孔颖达疏语“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为箴辞”即是此意。由上述文字及其分析可知,此处之“官箴”是两个单音节词,而不是一个名词,《虞人之箴》和其他文武百官的箴辞才是他们对周天子的劝诫之辞。

作规谏用的动词“箴”,还有一个引申义,即作名词“规诫劝谏的话”,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云: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

孔颖达疏云:“诗辞自是箴谏,而箴谏之辞,或有非诗者,如《虞箴》之类,其文似诗而别。”〔1〕所谓“箴谏之辞”,就是“规诫劝谏的话”。据先秦古籍记载,夏、商、周三代时就已有告诫性质的《夏箴》、《商箴》和《周箴》等专书问世,因其早佚,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仅吉光片羽传世,如:

《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2〕

《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3〕

《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4〕

〔1〕 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逸周书·文传》。

〔3〕 《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4〕 《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不过，由于辗转相传，不论是从记载它们的书籍看，还是从语言风格看，其真实程度尚有待深考之后才能确定。

二

官箴的发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先秦至两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唐、宋、元时期为第二阶段，明、清时期为第三阶段。

在传世的较为可信的先秦古籍中，关于劝戒之类的各类箴言颇为丰富。其中，针对各级政权机构主事者（天子、国君和文武百官）的箴言较多。有“帝王教科书”雅称的《尚书》，较为集中地汇集了对天子国君的规诫，如“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1〕。即是周天子对康侯的告诫，希望他竭尽心力安抚民众，并且不要贪图逸乐，才能治理好国家。

还有许多零散的告诫各级官员的箴辞，如“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2〕；“廉者，政之本也”，等等。〔3〕虽然此时尚未出现“官箴”一词，但后世的官箴却是由它们分化、发展而成的。

汉成帝好微服私行，有失帝王身份。扬雄写作《州箴》寓有规谏之意，可是他并没有明说此意，只是说《虞人之箴》可圈可点，“箴莫善于《虞箴》”，于是仿其意而“作《州箴》”，即各州之长各据自己职责所掌劝谏天子。此书即后世

〔1〕《尚书·周书·康诰》，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吕氏春秋·离俗览·贵信》，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3〕《晏子春秋·杂下》。

所盛推之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东汉时,《州箴》亡佚了九篇。唐人孔颖达在研究了《州箴》的传承后指出“崔骃、骃子瑗、瑗子寔世补其阙,及临邑侯刘驹骏、太傅胡广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胡)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并认为他们的补作“皆仿此《虞箴》为之”。〔1〕显然,此时的官箴是官吏规谏君主的箴言。

崔骃祖孙三代皆儒学名臣,世补其阙,名儒兼名臣的胡广又再次续作,称之为《百官箴》。可见此时官箴仍为规谏君主之箴。这一阶段可看作是官箴的产生阶段。

至迟在唐代时,官箴书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唐朝再建统一国家时,首先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建设。为此,皇帝要求各级官员无条件地维护皇家利益。官箴的主流即由规谏君主而变成了对各级官吏的勉励和告诫。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臣轨》当是官箴改变性质后的第一部官箴书。〔2〕

《臣轨》成书的垂拱元年〔3〕,正是武则天频繁更换宰相、提拔新贵、重新建立亲信集团的时候。为了牢牢控制他们,使之成为只忠于自己的臣子,武则天在封官赐爵之后,更以《臣轨》作为灌输忠心、奴化臣僚的工具。武则天称制执政伊始〔4〕,

〔1〕 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今传本《忠经》旧题东汉马融著。清人丁晏因此书避唐太宗、高宗讳,认为它是唐人马雄托名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崇文总目》始列其名,其为宋代伪书,殆无疑义”。总之,此书只能列在《臣轨》之后。

〔3〕 《臣轨》书末题有“垂拱元年撰”。

〔4〕 其时武则天以太后称制仅一年多。三年后,亦即垂拱四年,武则天始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认为“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所以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故以兹所撰，普锡具僚，诚非笔削之工，贵申裨导之益……佩兹箴戒，同彼韦弦。修己必顾其规，立行每观其则。自然荣随岁积，庆与时新。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俱泰”〔1〕，便指令几名大臣编写《臣轨》一书。书成之后，自署其名，号称“御撰”，并曾于长寿二年（693年）颁行于世，诏令天下习之。此书分十章，要大臣认识到君臣一体，胜于父子之亲，进而做到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从事君、辅君的立场出发，去做对民众有利的事，武官则要成为良将，从而对文武百官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和告诫。《臣轨》全书主旨，要在劝导官员尽忠皇上，即使是那些教育官员廉洁从政、公正爱民之语，也以此为旨归。从官箴后来的发展看，此书的体例、内容对后世官箴书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现有资料，“官箴”作为一个名词使用，似也始于唐代。唐代诗人王维在《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一诗中说：

人外遗世虑，空端结遐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
苍生诟有物，黄屋如乔林。上德抚神运，冲和穆宸襟。
云雷康屯难，江海遂飞沈。天工寄人英，龙袞瞻君临。
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质贯方领，清景照华簪。
慷慨念王室，从容献官箴。云旗蔽三川，画角发龙吟。
晨扬天汉声，夕卷大河阴。穷人业已宁，逆虏遗之擒。
然后解金组，拂衣东山岑。给事黄门省，秋光正沈沈。
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

〔1〕《臣轨·序》。

据“从容献官箴”句看，此诗中的“官箴”为动词“献”的宾语，毫无疑问是一个名词。从诗的文义不难看出，诗中之“官箴”是指向唐皇呈献的规谏之类的箴辞。

大致到宋代时，“官箴”一词的内涵扩大，也有了告诫官员的含义，包括如何做官，如何做一个好官的所有箴言。同时，它又有所变化，即规谏天子之义反而用得极少。这由宋人吕本中所著《官箴》一书可以得到证明。此书以“官箴”为书名，且完全没有涉及天子，所载内容全为对各级官员的告诫。到明朝时，宣宗朱瞻基也制作了一本《官箴》。这不仅更加明确地限定了官箴的对象，同时也使得“官箴”一词在官场更加流行。

相比前代而言，宋、元时期的官箴书稍有发展：首先，是数量上较以前要多，传至今天的就有十余种。其次，是质量上较以前要高，官箴书的作者，诸如吕本中、朱熹、真德秀、张养浩等人皆为当时儒学名臣，且都是循良之吏的典范，所作官箴书都是自己实际经验教训的总结。再次，是内容较以前要丰富。这个丰富可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几乎涉及了官吏一生活动的所有方面，从他们的读书、修身到进入官场之后的赴任注意事项、人际关系、各种政事的处置，几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是涉及了君主之外的各级官吏，上至宰辅三公，下至州县幕僚，无不在告诫之列。这一阶段可看作是官箴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官箴书进一步发展、成熟。此时除了数量上的激增外，由于重视选入官吏的懿行善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此时 50 余种官箴书中，明人杨昱的《牧鉴》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堪称官箴代表作。和以前不同的是，明、清时的官箴书基本上都是以知府、知县等地方亲民官为告诫对象，特别强

调了对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亲民官”的要求。这说明统治阶级已意识到了官与民矛盾的焦点正在这些直接管理民众的地方官身上。这一阶段可看作是官箴书的成熟阶段。

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官民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官箴书数量锐减，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所谓树立公仆思想，加强廉政建设，其实就是古代官箴书在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很值得总结，只是已超出本书范围了。

三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官箴书形成了三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官箴书以儒家学说作为核心思想，同时兼用法家、道家思想指导统治手法。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士人认为儒家学术是立政之本，从政是实现自己济世安民抱负的最好途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读书求官、出仕执政时都以仁、义、礼、智、信指导自己修养身心、待人接物和恪尽职守。例如陈璘在为《三事忠告》作序时就说：“为政之道，载在六经子史，昭如日星。”〔1〕《三事忠告》类目虽然繁多，大要其实只有三个：“曰忠、曰敬、曰仁而已。”同时，古代官吏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又有意识地运用法家和道家的思想手段，官箴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言和事。这就使官箴书成为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思想色彩的混合体。

其二，官箴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官箴书的作者，除少数君主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政多年、政声卓著的循良之吏，如《政经》、《西山政训》的作者真德秀，《三事忠告》

〔1〕《三事忠告》即元人张养浩所作《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种官箴书的汇编。